

doi: 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5.021

智媒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信任： 谱系、困境与建构

凌韵¹ 赵森²

(1.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智媒时代到来,数字智能技术使人类的信任形态发生转向,分别由信任熟人转向信任他者,由人际信任转向系统信任,由道德依赖转向算法计量的数字信任。在此背景下,智媒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深刻的信任困境,具体表现为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模糊、思政教育受众的偏听偏信、思政教育内容的范式滞后、思政教育媒介的隐私窥视。为治理信任危机,塑造思想政治教育的数字信任,应增强思政主体的身份辨识、培养思政受众的算法素养、保持思政内容的话语更新、坚持信任异化的系统治理。

关键词: 智媒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 数字信任

中图分类号: G41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7835(2023)04-0167-09

思想政治教育(简称“思政教育”)作为一项立德树人、教化真理的信息传播活动,信任在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①。在万物皆媒、算法当道的智媒时代,数字智能技术重塑社会交往活动的同时,也解构了传统信任关系与机制,包括思政教育在内的诸多社会范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信任危机”。本研究通过对信任谱系梳理,把握智媒时代数字信任转变特征,并结合智媒时代思政教育面临的具体情境,明晰信任危机的问题表征,探究治理思政教育数字信任的建构路径,以期在智媒时代有效发挥思政教育功能,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与针对性。

一 信任的谱系:智媒时代思政教育信任形态的转变

学术史上,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他强调“离开了人们之间的一般性信任,社会自身将变成一盘散沙。”^②后历经韦伯、雷丁、维特根斯坦、吉登斯、福山等学者的深入研究,直到 20 世纪末,信任开始成为一门显学^③。如今,随着智媒时代的来临与传播样态的变革,信任形态在悄然发生变化,随之对思政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建构产生影响。通过梳理信任谱系可以发现,直至智媒时代,信任的样态呈现由信任熟人向信任他者、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道德依赖向算法计量的转变特征。

(一) 由信任熟人向信任他者的转变

以吉登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认为,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家族为纽带的熟人社会,即“低信任社会”,造成这种信任形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般认为,源自早期人类“本体性安全”的需

收稿日期: 2023-03-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BEA180117);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培育基金资助项目(22SK11); 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202220208)

作者简介: 凌韵(1990—), 女, 湖南浏阳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①思想政治教育在本研究中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遵循人们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参见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0 页。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学校教育,教育对象主要指广大人民群众。

^②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11 页。

^③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8 页。

要。吉登斯将人的基本信任定义为人类“对他人连续性及其客观世界的期待”^①。这种基本信任源于婴儿对母亲产生的“本体性安全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新生婴儿是各类生命冲动的集合,母亲养育并帮助婴儿进行适应与平衡。这种身体上的在场产生了人格特征上最初的信任。一旦母亲缺场,便会带来“本体性安全感”的缺失,这是一种存在性焦虑。从早期生活开始,婴儿和看护者相伴与“本体性安全”联结得以确立,并逐渐将范围扩展至对熟人的信任。以血缘与家族为纽带的熟人信任克服了存在性焦虑。

同时,信任熟人还受到时空扩展条件的限制。在前现代时期,时间被空间所限制,人们在有限空间内生活交往,熟悉的环境保障了所接触的人或物的可靠性。各种社会关系在商场、会场等具体环境中大量交织,形成了地域化本体性安全感。人们无需与遥远的他者产生交往与信任,生存需要始终会得到满足。

到了web3.0后的智媒时代,人类信任形态开始由对熟人信任转变为对陌生他者信任。“陌生人社会”这一概念由法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提出,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支配。随着通信技术与工业的发展,信任时空限制被打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空间萎缩”,“火车将欧洲缩减为大约是德国的面积”^②。正如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指出的“我们正在迅速逼近人类延伸的最后一个阶段——从技术上模拟意识的阶段……刊登广告推销产品的客户长期所谋求的,正是人的意识的延伸。”^③新一代云计算与边缘计算使人类的交往体验遍及全球,人们足不出户,只通过AR穿戴设备便可享受世界各地的生活体验。智媒时代交互性的增强使人类日常生活中交往的对象不再局限于熟人,更多的是来自远方的他者。与他者共存渐渐成为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依靠兴趣结缘的各类网络社群,同样可以提供信任,帮助人们克服本体性安全的缺失,人们的信任

形态正在悄然向信任他者转变。

(二) 由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变

现代社会信任形态开始由“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信任转向“人与物之间”的系统信任。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信任视为“人性与自然自明事态的本性”^④,并认为信任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之一。面对复杂世界,人类无法获得完整信息,而信任可以弥补信息缺位。在他看来,“风险”与“信任”相伴相生,风险意味着复杂社会中不确定性存在,而信任则代表了不确定性吸收^⑤。在前现代时期,受生产力条件所限,人们面对的风险更多来自自然灾害、疾病与原始暴力。人类主要通过与他者建立“对诚实或他人爱的信念”来聚集合作,从而抵御风险,简化社会复杂性。

随着信息终端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社会复杂性远胜从前,人类面对的风险也不仅是自然灾害,还有工业革命、战争等现代社会结构风险(如核威胁、信息犯罪、环境污染等)。身处“风险社会”的人类仅凭人与人之间的朴素信任,亦无法抵御全球化的风险,以社会系统为对象的信任形态开始出现。由此吉登斯引入“社会系统”概念,并拓展了信任的定义,即“个体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⑥。其中,社会系统特指抽象的现代社会系统,主要包括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象征标志指的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如货币、传媒等,它们是构成社会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专家系统则是指由专业化知识和技术人员组成的体系,影响人类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对现代人而言,与其说信任专家系统,毋宁说是信赖系统背后专业知识的可靠性,这是一种常人不能详尽验证的知识。智媒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介终端构成了连通象征标志,这些媒介与组织系统合作,将社会关系从具体情境中分离出来,通过抽象化、系统化的计算,简化社会的复杂性,降低所面临的风险。

(三) 由道德依赖向算法计量的转变

智媒时代的信任形态,由传统社会对道德品质信任转向对算法计算的信任。以韦伯为代表的

①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2页。

②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7页。

③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

④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⑤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瞿铁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⑥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西方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甚至认为中国人“是绝无仅有的不诚实”^①。明溥恩、雷丁、福山沿袭这一思路,普遍将对外人的信任程度与对国家的信任程度画等号,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对此中国学者做出了有力回应,彭泗清指出,不同于西方以法律这一“外在制度”为基础的信任,传统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实质是以伦理道德这一“内在制度”为信任基础。如晋商享誉世界的票号金融活动便是以此为依据。

到了智媒时代,以道德依赖为主的信任形态开始向数字信任让步。数字信任是一种可计算的信任形态。“不存在所谓的信任,只有不同程度可信承诺。”^②有学者精确地指出,预期利益相对易损性是信任程度的理性基础。马什(Marsh)开创性地对数字信任建立了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并为其规定了一系列公理和假设基础^③。系统可以根据数学模型计算用户的可信度和预期损益,并以此支撑庞杂的社会交往。在智媒时代,数字信任正逐渐融入传统人际信任与系统信任,构成更加开放包容、精确合理的信任形态。

吉登斯指出,后传统社会的人类交往方式类属于一种社群化的创造,社群成员彼此相隔千里却维持着团结。而这种新式的社会形态“既不是礼俗社会、也非法理社会”^④,它的团结机制不能再依靠涂尔干所讲的“集体意识”或“道德品质”来解释,而是需要对他者与系统保持更大开放性。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信任的概念应运而生。早期数字信任特指组织成员和消费者对组织保护隐私数据所持有的信心。随着组织这一概念的开放性逐渐增强,数字信任的对象演变为对

技术、算法、机器等非人格化的客体。又因一些智能技术(如深度学习、区块链)的渗透率、泛在性等特质远超个体所能理解的范畴,因而数字信任的客体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主体性地位。

既有研究指出,新媒介形态的出现改变了信息获取方式与信任形成^⑤。一方面,学界发现新媒体运用对于提高民众对政府信任有良性影响。中国各级政府在运用新媒体发布信息时,可以与群众形成良性互动^⑥。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会导致虚假信息泛滥,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⑦。更多学者发现,使用新媒体与建立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⑧,技术的应用如何影响政府信任仍属于待解谜题^⑨。总之,新的媒介形态带来了信任形式的转变,这种改变对智媒时代思政教育的信任来说,既代表机遇,也代表了困境。

二 信任的异化: 智媒时代思政教育信任的困境

基于算法建构信任对传统信任形态提出的挑战,人类开始意识到专家与系统认知的局限,对以往思政教育主体信任开始消解,逐渐陷入了“塔西佗陷阱”。新信任建构形态引发思政教育信任困境,具体表现为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模糊、思政教育受众的偏听偏信、思政教育内容缺乏共鸣、思政教育媒介的隐私窥视。

(一) 判断失效: 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模糊

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媒介与话语权赋予思政教育主体特定的“角色”与“地位”,同时建立了相应的角色信任。角色信任可以帮助受众在接受思政教育过程中减少不确定性,节省建立信任

① 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4页。

② 奥利弗·E·威廉姆森《治理机制》,石烁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59—278页。

③ Marsh S. Trust in Distribut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uropean Workshop on Modelling Autonomous Agents in a Multi-Agent World.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92, pp. 94-112.

④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⑤ 郭士祺、梁平汉《社会互动、信息渠道与家庭股市参与——基于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4年第S1期。

⑥ 孙宗锋、郑跃平《我国城市政务微博发展及影响因素探究——基于228个城市的“大数据+小数据”分析(2011—2017)》,《公共管理学报》2021年第1期。

⑦ Guriev, Melnikov Zhuravskaya E. “3G Internet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21, 136(4): 2533-2613.

⑧ Klein, Robison. “Like Post and Distrust? How Social Media Use Affects Trust in Governmen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20, 37(1): 46-64.

⑨ 杨旒《融媒体时代的政府公共关系: 分析政府信任的第三条路径》,《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12期。

所需的时间成本,因而成为简化传播复杂性的重要机制。伴随着智媒时代的到来,信息受众对特定角色的有效性和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受众对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信任产生了模糊效应。

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模糊,首先体现在思政教育主体的权威性减弱。在智媒时代,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受众获取权威信息的渠道增多。无处不在的信息终端赋予不同个体普遍的表达权力,造就“万物皆媒”的传播景观,同时也削弱了传统媒介话语的权威性。例如,人们对所谓意见领袖(微博认证的大V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普遍不再信任,甚至因为屡屡爆出的学历造假、经历造假事件而对专家头衔及其背后代表的资格与专业能力有所质疑。诸如“反诈老陈”等网红人物的“翻车”,使人们对于过去普遍承认的正面人物与权威形象产生怀疑。

思政教育主体的角色模糊,还体现在思政教育主体的平台化倾向。传统媒体的优势在于其严格的信息审核、专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强大的采编能力,而这些优势在智媒时代随着通信技术、短视频、算法推送机制的发展被融化消解。与之一起消融的还有传统的传播者与受众、中心与边缘、真实与想象之间的各类边界。边界的消融意味着传统思政教育特色的消解,网络思政主体转变为媒介平台的众多账号之一,在未来需要更多地依托第三方用户平台来获得用户信任、完成内容的分发,与更多草根媒体“同场竞技”。如此而言,角色模糊与整合重构成为网络思政教育主体发展路径的一体两面。

(二) 偏听偏信:思政教育受众的路径依赖

智媒时代的思政教育信任异化,还表现在受众生成信任时的固有路径依赖,其特征首先表现在人们生成信任时情绪在先,事实在后。智媒时代,掌控用户平台,就意味着掌控未来^①。一些信息制造者秉承“流量至上”的原则,不惜炮制虚假信息,只为引发大众负面情绪,博取关注。一旦争议性事件浮现网络,潜藏的消极情绪会以传播谣言的方式扩散开来。

如“小学生为教师打伞”事件,就是信任异化

的典型样本。2015年,一张上海小学生为老师遮阳打伞的照片引发了热议,照片里系红领巾的小学生将伞高高举起,穿着时尚的老师十分“享受”学生的服务。由于近年来负面事件频发,教师形象逐渐被“妖魔化”。在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事件持续发酵,包括家长在内,越来越多的受众加入声讨队伍。约七成网友指责老师,先入为主地将老师看作是欺凌的一方。事件调查期间,各路网友不断对学校施加压力,对没能立刻给出调查结果予以“阴谋论”的解读,甚至认为学校的调查声明单纯只是为了息事宁人,导致本应作为思政教育者的学校与教师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然而经过调查,事件彻底反转。事实上,教师仅仅出于融洽师生关系的需要,对学生的请求没有拒绝,却被网友口诛笔伐,无端指责。智媒时代信息受众在情绪的裹挟下,只相信自己眼中的事实,造成了信任的偏差与异化。

受众信任的路径依赖特征还体现在人们信任生成时的成见在先,真相在后。有学者指出,个性化信息服务兴起,使人类被包围在偏听偏信的“信息茧房”之中,我们只接受能够愉悦我们的信息^②。信息茧房概念来自美国传播学学者桑斯坦,他认为正是由于个性化信息服务对信息进行了选择与“过滤”,导致比起事实真相而言,人们固有的态度和偏见更能左右信任的生成。智媒时代的信息内容要经过多方面的过滤才能到达受众。首先是来自平台的过滤机制,允许生产者上传哪些内容、允许向哪些平台进行分享、对特定信息给予优先的级别都成为平台过滤信息的装置,这些装置无形中使得某些信息被忽略。其次是来自社会关系网的过滤机制,个体选择点赞、转发的信息更多与立场相关,对特定信息呈现的态度直接涉及个人社交形象、关系的建构。人们也会坚定地选择代表自己的意见领袖,随意见领袖的态度采取立场,用以标记自己的社交属性。最后是来自算法的推荐机制。推荐算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受众获取有效信息的成本,将算法认为受众不需要的内容过滤掉。当前主要的推荐算法机制

^①彭兰《未来传媒生态:消失的边界与重构的版图》,《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②凯斯·R·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包括基于内容的推荐、协同过滤推荐、混合推荐等^①。各类算法推荐机制协同作用,根据用户的行为偏好或群体既有兴趣进行筛选过滤,使信息受众的偏好不断强化,进而可能导致受众视野逐渐窄化,置身于由特定态度和先见组成的信息茧房中。智媒时代的信息受众借助态度与先见,只相信自己眼中的事实,对信任谁、如何信任产生想当然的判断,是值得思政教育深思的问题。

(三) 共鸣薄弱: 思政教育内容的范式滞后

智媒时代到来,网络思政教育范式也随之发生转换^②。作为网络思政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范式在生产模式、呈现形态、叙事逻辑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使得思政教育主体与客体之间共鸣不足,影响二者之间的信任建构。

首先,在生产模式上,智媒时代的思政教育内容仍停留在“千人一面”,尚未完成精准化转向。思政教育本质是深刻且严肃的,面对智媒时代信息的海量增加,思政教育却呈现一定程度的“内容焦虑”。一方面,思政教育需要把握智能媒体的即时性特征,注重信息议程安排的精准性。针对党和国家重要理论政策、热点问题,在第一时间结合舆论态势,用快速、正能量的内容开展。另一方面,网络思政教育应紧贴受众的生活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处理好“接地气”生活与“高大上”道理之间的关系。此外,网络思政教育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时政结合,但在信息内容方面,却难免具有新媒体碎片化、娱乐化的缺陷。部分思政教育工作者强行将教育内容与社会热点结合,结果却只能是“为结合而结合”。因此,网络思政教育应注意避免教学的本末倒置,陷入既无趣又单调的怪圈。

其次,在呈现形态上,智媒时代思政教育内容需要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智媒时代之前,传统媒体是社会主流信息传播渠道,位于内容供给链的最顶端,受传播方式的影响,传统思政教育的内容多呈现平面化、符号化特征,受众只能被动接受。但是,在流量取胜的智媒时代,主流媒体不再是唯一的内容生产者,互联网中心化浪潮赋予

受众更多的媒体参与权,实现了“每个人向每个人传播”,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可以被倾听,受众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得以彰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③思政教育主体的指向是人民群众,思政教育要激发受众接受教育信息的兴趣,真正实现人民既是思政教育的“参与者”,同时也是思政教育的“接受者”,激发主客体之间的共鸣,让思政教育真正内化于“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不仅仅是平面化的符号堆积。

最后,在叙事逻辑上,智媒时代的思政教育内容需要由理性认同转向情感认同。马克思指出,人是理性与感性并存的存在物,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④。思政教育作为立德树人、教化真理的传播活动,要获得受众的共鸣与认同,不仅包括理性认同,更重要的是情感认同。长期以来网络思政教育多采取政策传达、理论说教等方式,聚焦对真理与价值的阐释,很难获得受教育者的共鸣,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建立智媒时代网络思政教育的信任,须从“冰冷”的理论阐释转向“有温度”的情感交流。网络思政教育要坚持从“受众本位”出发,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差异性,根据差异化的情感需要与心理特征生产供给教育内容,注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发情感共鸣,建立双向信任。

(四) 隐私窥视: 思政教育媒介的伦理失范

在智能连接、万物皆媒的传播生态中,信息的多载体快速流转、信息存储成本的降低使思政教育领域的信息收集、访问、共享、利益分配更加便捷。技术在重塑思政教育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数据伦理风险,直接影响思政教育主客体之间信任的建构与存续。思政教育数据伦理风险具体涉及隐私数据侵犯、预防性惩戒削弱自由意志、过往数据限制发展等伦理问题。

首先,智媒时代无所不在的数据收集会侵犯人们的个人隐私,造成隐私窥视。福柯受功利主

①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新闻界》2020年第1期。

②赵玉枝,胡树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内涵、成因及意义》,《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6期。

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2页。

义代表人物边沁的“敞式监狱”理论启发,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全景监狱”社会治理模式。治理者站立于环形监狱中间的瞭望塔中,而囚徒被孤立分隔、永不可见,只能顺从治理者一览无余的监视^①。在福柯的理论基础上,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提出“超级全景监狱”的构想^②:数字化社会的受众,就生活在类似全景监狱的数字化监控之中,在非干预的自然状态下,个人隐私变得更加易得且透明。一切个人信息都逃不过机器和算法,美团记录着人们的饮食偏好,微信掌控着用户的社会关系,输入法记录着人们的言语,抖音可以捕捉偏好的内容。智媒时代为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使隐私窃取变得更加容易。这样的隐私生态使受众的名誉、财产甚至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倘若时下的思政教育者对人们在意的数据隐私风险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那么必然会在思政教育主客体信任构建方面困难重重。

其次,大数据精准预测阻碍了受教育者的自主决策。大数据预测甚至不需要思政教育从业人员的介入就可以提前为思政教育对象规划好应该遵循的行为路线,以减少可能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供最优化的思政教育方案和发展道路^③。然而,如果一切行为合理又合算,人们的未来会被精准地预测,按图索骥的行动会使人们失去选择的权利。美国一些城市已经将数据预测运用于社会治理,使用“预测警务”系统来决定哪些群体应该处于监控之下。一方面,大数据预测有利于维持社会的长治久安,构建一个纯净的思政教育环境;但另一方面,除了行为判定预测结果可能出错外,更重要的是它还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与选择权利,违背了思政教育公平正义的价值基石。根据预测就对受教育者尚未实施的行为进行惩罚,不仅没有办法构建当前长久的信任基础,甚至会将思政教育未来的信任透支。

最后,数据过久的保存期限也会限制受教育者的发展。与生物记忆不同,更加全面、持久的数字记忆随着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大到国家、小到个人数据,遗忘似乎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更加长久的保存期限也增加了思政教育数据滥用

与教育不公平的风险。受教育者的不良记录如果被打上数字记忆的烙印,终会生成难以消除的“数据尾气”,始终面临被追溯的可能。这样一来,对思政教育对象来说,过往的无心之失可能像定时炸弹一样,限制了其长远发展的机会。更有甚者,在面临重大考核之时,既有过往数据会不恰当地决定受教育者的命运,使思政教育的公平性受到质疑。思政教育者应当秉持宽容的心态,以增值评价的视角看待思政教育对象的发展,避免因对数据的过度信任而损害教育主客体之间的信任。

三 数字信任的建构:智媒时代思政教育信任危机的治理

面对智媒时代全面而深刻的信任危机,思政教育主体应主动顺应媒介发展趋势,在充分把握新媒体大数据发展规律基础上,专注守正创新,增强思政主体的身份辨识;加强认知引导,培养思政受众的算法素养;保障思政教育手段的自我变革,保持思政内容的话语更新;进行系统监管,构筑思政媒介的数字信任。

(一) 守正创新,增强思政教育主体的身份辨识

首先,要运用差异化思维,坚守思政教育的身份定位。一是要坚持主流文化价值导向。在智媒时代,以大学生为代表的受众追求快餐化、碎片化的浅阅读,许多严肃深刻的思想议题,却以无厘头、娱乐至死的方式呈现。对反思价值、人文精神等主流文化需求会显得稀缺珍贵,这也是智媒时代思政教育“内容为王”的优势所在。当信息沦为快餐时,网络思政内容以其主流特质和差异化呈现,成为精神盛宴。二是要坚持思想深度和文化高度。智媒时代自媒体竞争激烈,失我所长并不是网络思政教育的出路与方向。海量资讯和休闲文化的泛滥尽管给传统的思政教育方式带来冲击,但一味地追求消费与享受会带来审美疲劳,要充分坚守思政教育信息严谨、话语权威的特质,将其作为文化载体,用差异化避免同质化竞争。

^①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Vintage Books, 1979, p.201.

^②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范静哗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7页。

^③常宴会《思想政治教育应用大数据技术的风险及其化解路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其次,要注重媒体矩阵搭建,扩大思政教育主体影响力。一是要着力搭建全媒体信息矩阵。不同于传统媒体,智媒时代的信息内容必须吸引一定网络流量,拥有足够热度,才能形成传播力和影响力。传统思政教育在改革内容生产模式基础上,要基于自身优势,逐步搭建全媒体矩阵,着力打造专属的“网、屏、端、微”自有平台,把思政教育传播内容投放至不同平台,扩大内容的网络传播效应。二是搭建媒体矩阵并不是在各传播渠道形式上的简单叠加,而是各媒体在传播手段、内容风格、排列周期等诸方面的深度融通。坐拥媒体矩阵,并不等于就有高流量与高信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准确地揭示出全媒体融合的理想形态就是“你中有我,我只有你”。

最后,要做好受众维护,培育思政教育传播的忠诚度。一是要与网络思政教育受众积极互动。全媒体矩阵的最终目标是拥有忠实稳定的用户群,仅仅依赖少数热门思政内容流量,或者只是多作品简单发布,仍无法满足智媒时代的受众需求。智媒时代的用户除了获取信息需求之外,更重要的是参与表达和创作的需求,评论、分享比观看更加重要。因此,培育网络思政教育受众的信任,必须形成互动互通的平台,及时接受受众的信息反馈、提供个性化平等沟通。二是要转换思维,以“用户思维”引导思政教育受众互动。全媒体矩阵的融合不仅是各媒介平台的融合,还包括传受双方之间的融合。在万物互联的生态下,“你中有我”也包含用户端在内。在保障受众忠诚度的基础上,网络思政教育才能形成品牌价值,生成信任。

(二) 认知引导,培养思政教育受众的算法素养

首先,要打破“信息茧房”,引导培育受众对算法的理性批判意识。智媒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信息环境,需要媒介受众具备理性算法素养。一是要了解算法机制的传播理念。算法机制会收集受众日常数据以建构目标群体的用户画像,并

以此开展个性化信息推送。受众最终会产生严重的媒介依赖,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失去理性批判能力。因此,思政教育受众应当在算法推送机制的基础上,学会运用理性对传播内容进行客观判断,开放包容以正视听,跳出“信息茧房”。二是要致力于提高受众媒介使用能力。除了掌握获取信息的基本能力之外,受众更要具备足够强大的媒介自控能力,即对信息的鉴别、防范与应对能力。面对海量的偏好信息,在了解算法推荐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加强自身媒介素养,将信息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其次,要立足本土,发展中国语境的媒介(算法)素养教育。立足中国语境的媒介素养教育,既不能机械地模仿北美模式,片面地将媒介素养视为传播能力的集合,也不能简单地学习欧洲模式,过于强调理性批评。忽视智媒时代本土媒介素养普遍偏低的现实情境,直接照搬世界现有的媒介素养教育模式,会导致媒介素养教育实施不力、动力不足。一是教育者必须坚持立足于中国语境,结合全球模式和本土经验,既要保障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能充分惠及每一位普通用户,亦要充分关照不同地区用户媒介素养差异巨大的现状。二是要注重媒介素养与人文素养教育相融合。素养教育要将人的主体性放在首位,突出人在算法中的主导作用。要坚持科技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原则,摒弃技术的迷思与依赖。作为思政教育的主体,高校可开设媒介素养通识课程或尝试在信息技术学、社会学等专业课程中引进相关内容,促进其与其他学科融合。

(三) 自我变革,保持思政教育内容的话语更新

首先,思政教育主体要贴近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消除话语表达隔阂。一是要了解受众的网络行为特征与需求。思政教育不仅是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培育。如果不了解受众真实的认知和接受情境,价值观培育便会流于表面。在智媒时代,思政教育主体要密切跟踪受教育者的发展历程,将受众网络行为方式与教育内容有机结合。在保障隐私数据的前提下,高校可以合理利用学工、后勤等数据系统,以合法的方式整合

^①《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思想基础》,《人民日报》2019年1月26日。

思政教育对象的生活态度、消费信息,为网络思政教育的开展提供实时信息支持。二是要加强对网络语言的把握,促进话语表达多样化。网络用语言简意赅、幽默活泼,能够反映一段时间内社会大众的关注焦点与情绪共鸣。将思政教育话语与之结合,可以有效促进思政教育主客体间的思想交流互动。但是,思政话语的网络化需要经过细致的教学设计与话语建构,绝不是二者的简单叠加。思政教育主体在增强受众对思政教育话语形式认同感的同时,又保持思政教育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做到既严肃又活泼。

其次,要厘清价值误区,纠正话语价值判断。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问题在舆论场中无序扩散,加之外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虚无主义等多元价值观充斥社交媒体,造成网络受众的价值评判普遍混乱与浅显。学生如何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思考判断,需要思政教育工作者合理引导,借助马克思主义原理进行科学的教化与培育。因此,思政教育教师应重视网络流行语的学理分析,在引导思政教育对象对外界信息进行判断时,要根据社会经验和道德实践需要,树立正确的网络话语价值判断标准。

最后,要加强思政教育话语队伍建设。提升思政教育者媒介素养本质在于人的话语创新,而话语创新离不开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与业务能力兼备的教育者团队。一是在个人层面,要促进思政教育者媒介素养的自我提升。思政教育者要主动适应智媒时代信任样态变革,提升自身媒介技术与媒介认知水平,树立科学的媒介素养观。同时要不断提升自我的理论水平,善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网络现象。二是在学校教育层面,要加强资源建设,全方位开展教师媒介素养培训。一方面,应通过培训、考察交流等形式,与权威专家、媒介机构合作学习,有针对性地全面提升思政教师队伍的媒介素养理论和实践水平;另一方面,要建构立德树人与媒介素养相配套的考核评价机制,兼顾师德师风、教学质量与媒介素养属性,建立系统、可操作的考核指标,并与教师工作的奖惩、晋升程序挂钩,做到及时的教学质量分析与反馈^①。

(四)系统治理,构筑思政教育媒介的技术信任

首先,要加强信任危机的技术治理。一是要增强信用基础设施的建设。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信用基础设施开始成为发达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中枢平台。为了实现跨层级的数据联通,信息终端需要向系统提供数字身份认证、安全密码来验证获取精准授权和访问路径。作为公共物品的信用基础设施,不仅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撑,最关键的是需要依靠政府权威来设立标准、保障实施和检验维护。二是要坚持“从不信任,始终验证”的零信任原则^②。“零信任(zero trust)”是近年来引入系统架构设计的新理念,包含显式验证(Verify Explicitly)、假定数据泄露(Assume Breach)等程序原则。这一原则在底层设计上保障了系统对用户身份、应用程序、数据等基本要素的一视同仁,来自任何位置的任意数据访问都需要进行验证,有效保障信息系统的可信度。

其次,要落实信任危机的媒介治理,增强信息的可信性。一是要保障决策的公开性与信息的对称性。智媒时代,信息纷繁复杂,不同信息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已成为常态。不同价值观、不同立场的个体都接收着不同的信息,产生不同角度的解读。只有广开言路,保证政策的公开、信息的透明,才是培养民众信任、消除误解的最好办法。二是要加强主流媒体作用。在混乱的舆论场域中,需要主流媒体发声来凝聚共识,以正视听,确立对社会事实认知的价值标准。面对突发公共事件,主流媒体发声稍有迟滞,舆论高地就有可能被流言抢占。主流媒体应该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威,坚守社会道德底线,勇于自我革新。在关键时刻不失声不缺位,保持客观真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最后,要重视信任危机的公共治理,坚持硬性监督与软性约束相结合。一是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做好硬性监督。世界许多地方在技术伦理法治化进程中,都在顶层设计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法案》以及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是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技术,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国际合作,结合本国国

^①吴满意《“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研究”述评》,《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2年第3期。

^②Rose S, Borchert, Mitchell S et al. *Zero Trust Architectu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2020, p.207.

情予以系统监督。二是媒介平台和互联网企业要加强自我约束。在智媒时代, 各大资讯平台掌握着媒介终端的代理权, 行使着近乎垄断的权威, 同时也加剧了道德与信任的风险。平台需要明晰社会责任, 不忘自我约束, 鼓励算法原理的透明化,

例如 2021 年美团外卖公布配送时间的算法模型。在优化算法时, 平台应尽可能依靠算法自我进化, 而非人为介入, 坚持以用户为中心, 尊重其知情权、选择权、举报权, 共同构建可信赖的算法信任环境。

Digital Trus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Smart Media: Genealogy, Dilemmas and Construction

LING Que¹ & ZHAO Sen²

(1.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mart media era,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has shifted human trust from trusting acquaintances to trusting others, from interpersonal trust to systematic trust, and from moral reliance to algorithmic measurement, respectively. In this contex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smart media also faces a profound trust dilemma, which is manifested by the blurred rol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ubjects, the biased listening and trus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udiences, the lack of empath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tents, and the privacy pry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dia. In order to manage the trust crisis and reshape the digital trus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should enhance the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of the subjec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ivate the algorithmic literacy of the audien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ep the discour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 updated, and adhere to the systematic management of trust alienation.

Key words: smart media era;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gital trust

(责任校对 朱春花)